

重組社會物質性—— 產業機具的差異襲產化

賴子儀¹、王志弘²

摘要

本文旨在提出襲產的存有論論題，藉此深化對襲產保存的思辨。襲產化涉及物件的意義詮釋、價值賦予、展示與再現，亦即物件在襲產化脈絡下的重新客體化與重新組裝。本文以產業遺址的機具保存與展示為例，探討不同的社會物質性與不同襲產化保存策略的關聯，藉此主張對於物的特性應有更多的關注。作者首先回顧襲產保存中，做為歷史見證之實存物、做為敘事指認之象徵物，以及做為社會行動之操演物等不同定位。作者進一步提出客體化、物的關係存有論，以及社會物質性重組等觀點，來拓展物件在襲產化中的可能樣貌。為了令論證更具體，作者基於參與觀察和二手資料，通過十鼓仁德糖廠、中油高雄煉油廠、建國啤酒廠等案例，說明不同機具的物質特性、襲產化樣態及其侷限與可能。作者另以洲南鹽場為參照，說明較少機具的非工業類產業襲產，也能通過物的重新定位和組裝，將襲產安置於更廣泛的社會關係、文化實作，以及地方創造的動態中，而擺脫標本化的思維。

關鍵詞：產業襲產、客體化、關係存有論、物質文化

前言

襲產化 (heritization)，也就是形成襲產（或譯「遺產」）的過程，經常涉及將原本不是襲產的物件、構造物、環境、技藝和活動等納入襲產體制 (heritage regime)，賦予它們特定意義、價值、論述、再現及文化形式，並從屬於特定法規、制度、機

關、維護技術、認知及使用方式。然而，即使襲產的關鍵在於保留和傳承，因而凸顯了對連續性、甚至「真實性」(authenticity) 的強調與維護，但是襲產化過程其實充斥著轉化 (conversion) 與重新連結的難題。所謂轉化，指的是即使襲產對象納入襲產框架時沒有改變樣態或形式，也已經改變了意義、功能及相應的對待方式。

¹ E-mail: D03544004@ntu.edu.tw

² E-mail: chihhungwang@ntu.edu.tw

何況，更多時候還需要予以修復、改建、維護，並置入以襲產身分來詮釋、再現、展示、觀看與對待的位置，也就是重新連結。簡言之，襲產化經常意味了從非襲產狀態脫離，並連結到堪稱襲產的脈絡中，而襲產乃是以襲產之名而納入襲產體制的事物。這樣的界定避免了對於襲產本質的追求，而是以襲產體制來確認襲產之名。

在期待保有連續性，特別是延續某種真實性的襲產化中，蘊含了這樣的轉化與連結，不免引發一些難題。例如，修復保存看似避免了崩裂頹圯，但其實經常令襲產更加與先前使用狀態脫節。再利用看似以持續使用來維持襲產的生機，但同時因襲產化而受到某些規範限制，也經常與先前的用途不同。即使是所謂的聚落活化保存，避免了標本化留存或脫離既有生活的再利用，但僅僅是冠上襲產之名而引來的旅遊活動及其他變化，也依然造成了擾動和轉化。當然，世界上沒有永恆不變的事物，無論是不是襲產，都不斷經歷著轉化與再連結。然而，當前的襲產化，究其根本乃是嘗試在持續的流變中，保存被認定具有價值的事物而令其不變或變得比較緩慢，但在萬事俱變的局勢中，這成了一項不可能的任務。

不過，保存意圖所面臨的轉化與連結，既是襲產實踐的難題，也激發了新的可能性。除在實務上謀求出路，理論性的重新思考也有必要。本文便嘗試針對物 (object, thing) 的引入過程、關係性的思考，來瞭解物在襲產化中所面臨的轉化與連結難題及如何在特定條件下可視為正面契機。具體的理論參照是米勒 (Daniel Miller) (1987) 挪取黑格爾 (Hegel) 的客體化 (objectification) 辯證觀點，以及在關係存有論 (relational ontology) 下對於物的拓樸空間性 (topological spatiality) 的解說，特別是羅 (John Law) (2002) 的觀點。這些主張跨越了主體 (個人和社會) 與客體的

分離，亦即超越主體與外在世界 (包含文化形式、物質文化) 的二分，進而可以將襲產化過程中的斷裂與再連結，視為社會物質性 (socio-materiality) 的重組 (reassembling)。

不過，在前述的一般性描述中，其實蘊藏著諸多變化。在襲產治理體制內，不同等級和類型的劃分，例如考古遺址、古蹟、歷史建築、文化景觀、古物、傳統工藝、民俗、口述傳統等物質和非物質遺產，便有差異甚大的轉化與連結模式，或者說是社會物質性的重組。本文為了凸顯轉化和連結的難題，以具體例證來說明這個基本難題，並從提示客體化過程和關係存有論的視角，特意選擇產業遺址的機具保存與再利用問題為案例。機具以及操作和維護這些設備的人員，是產業運轉的核心。然而，當產業成為有待保存的襲產化遺址，機具通常不再運轉，而且因為缺乏維護而失去作用或毀壞。再者，晚近強調再利用的襲產經營，往往保留廠房等建築構造物，將其視為可以收納新活動的容器，以及歷史導覽的代表性對象，但機具設備卻必須清除以便確保安全、減少維護成本，並騰出再利用空間。於是，產業遺址中的機具在襲產化的轉化與再連結中，特別會成為問題，或者說，會被擠向邊緣而缺乏討論。

目前臺灣的產業襲產多數屬於國公營企業，在市場與技術變革下面臨經營困境，甚至停止運轉。但許多過去位於郊區的產業空間，在都市區域擴大下已成為核心區位，蓄積了龐大的再開發利益。1990年代中期以後，官方治理逐漸往新自由主義靠攏。2000年政黨輪替後，民進黨政府欲減除國民黨舊勢力並掌握國公營事業資源，另一方面也通過國公營企業的民營化和土地再開發，拉攏企業財團投入以拓展政經影響力。不過，源於學界和民間的文化保存壓力，稍晚官方也開始推動產業

襲產保存計畫。1998年開始的閒置空間再利用計畫，誕生了鐵道藝術村與五大創意文化園區，至2002年時，文建會中部辦公室與學者專家鑒於當時國營事業民營化浪潮下，許多產業襲產可能就此湮滅而開始藉由體制內力量要求國公營事業進行清查保存工作（施國隆，2009: 10）。近20年來，已進行水、電、鹽、油、酒、糖、菸、水泥、化學、機械、造船、煉鋼、製藥、食品、紡織、鐵道等產業襲產清查，並延伸至許多學校、軍隊及其他政府機關（夏鑄九，2006: 94）。除了出版許多調查報告和研究，後來更結合文化創意產業政策，推動各產業襲產的文創園區化。

於是，部分舊有廠房機具便在文史保存意識升高下納入了襲產範疇。但是，機具設備的處理往往是保存再生計畫的難題，許多經營單位困擾於如何面對龐大機具設備的保存與展示。位於精華地段的產業襲產文化園區，為了容留再利用空間，多數清除了設備，僅留下建築物，例如松菸文創園區、華山藝文特區，以及士林紙廠。有些機具設備雖然難以運用或處理，但礙於襲產之名而無法清除，如十鼓糖廠、自來水博物館、溪湖糖廠，以及高雄煉油廠，通常採取靜態保存。只有少數案例如建國啤酒廠、洲南鹽場，以及臺電的幾座水力發電廠，或主動或被迫採取動態使用保存，留存了較完整的機具設備及技術。當然，有更多案例是在土地開發前景的名號下，即使經過了襲產調查，最終仍夷為平地。

本文試圖探索產業襲產保存中，機具的物質特性如何影響其保存樣態，並進而提出以新觀點來理解物件，可以有何新的襲產認識。後文首先說明在保存與展示脈絡下，物件概分為**實存**、**象徵與操演**這3種基本模態。實存物經常做為歷史見證；象徵物件連結於各種價值導向的敘事；操演的物件則涉及人與物的互動，或衍生出

創造事物之新意義和價值的社會行動。接著，作者援引客體化、關係存有論，以及社會物質性組裝等概念，來拓展對於機具等襲產化物件的理解，以窺探更多可能性。為了深化討論物質性與襲產化的議題，作者以十鼓仁德糖廠、中油高雄煉油廠、建國啤酒廠，以及洲南鹽場等，不同產業類型中具代表性或有爭議的案例為討論對象。後續將闡述4種典型產業襲產化樣態中，物質性對於保存策略的影響，並呈現出物與物、物與人，乃至於人與人的各種關聯，以及相應的物質轉化模式。作者主張，面臨產業機具襲產化的轉化與連結難題，凸顯了當前產業襲產保存的認識論和存有論限制，我們可以從過程和關係性視角來思考，將襲產化視為社會物質性的重新組裝。關注這些組裝的可能方式和效應，有助於釐清襲產化乃廣義的社會轉變的一環。不過，這種主張雖立基於關係存有論，但必須考慮物件兼有穩定性及可滲透性（亦即，擁有邊界，但邊界可以改變或滲透），而非全然取決於無邊無際的動態鏈結網絡。再者，物的保存是在流變中被價值化而成為襲產，並局部或徹底改變其原有的網絡關係，亦即產生社會物質重組。因此，相較於關係存有論較難處理價值化的課題，作者提出「賦予價值的關係存有論」做為產業襲產物的存有觀點，藉此收攏襲產化物件的特質，亦即這些物件乃通過特定價值評斷而納入襲產體制，並塑造其襲產存有地位。

理論視角：襲產物、客體化與關係存有論

目前臺灣產業襲產的活化再生方式，往往喪失原有生產功能，不僅機器和人員消失，甚至廠房本身也是清除對象，或成為再利用的容器，轉型成為文化經濟的新積累場域，以導入消費為主的活動。無論

是停止營運後的產業襲產化，或是維持營運但賦予其襲產地位，都使得特定場址中的機具、物件、廠房等有所轉化而納入襲產體制，連結於襲產化的運作情境。以機具物件為焦點來思考，格外能夠顯示襲產化所促成的轉化和再連結，也就是原本功能和效率導向的生產機具，在襲產轉化後若非淪為廢棄物或背景，就要納入襲產體制而建構新的連結，包括文化、社會、政治或經濟領域的連結。這樣的襲產化連結有很多種型態，可能是消費性再利用的背景，成為襲產觀光或文化經濟的一環，也可能是彰顯技術進步史觀的見證或各種價值論述的象徵，以及在少數狀況下成為社會行動的媒介。這些不同的襲產物 (heritage object) 定位，顯露了不同的襲產化策略。

一、襲產物的作用：實存見證、象徵指涉、操演媒介

博物館學、人類學及考古學等學科，近年以物質文化 (material culture) 研究為核心，探索物所體現或串聯的社會文化動態，形成「透物見人」的視界。從最初以特定物質之製作、美學和功能的考察為主，後來延伸至人與物關係的象徵體系及身體經驗的分析 (李如菁，2002: 46-48)。於是，物的保存與展示便不侷限於單純的功能說明，而是要置入廣大的社會文化脈絡中來理解其存在、意義和價值。博物館是典型的物件典藏和展示場域，其中有關物質的探討有助於反思產業機具保存展示的課題。

王嵩山曾以人類學角度來界定展示物的 3 個面向：工藝技術與物質實體、製作過程與知識，以及目的或象徵。他也區分出 3 種物質類型：實用器物、宗教或社會制度，以及美感價值 (王嵩山，1990: 41)。王嵩山還引介學者 Fred Schroeder 的 7 種物質展示設計方法：如何製造、如何

使用、存在環境為何、如何發展、如何與其他文化比較、影響設計的因素為何，以及功能的意義或價值等 (王嵩山，1990: 44-45)。不過，物的面向雖然眾多，大致上可分為物質製作技術和象徵意義這兩大範疇，也就是物的實體存在和價值詮釋，構成了博物館物件的基本面向。

再者，無論是聚焦物質技術或象徵意義的研究，都重視物和多人的多重關係。例如：以加拿大獨木舟博物館中的原住民船隻蒐藏，討論原住民與蒐藏家之間的社會經濟關係，揭示蒐藏品背後的歷史與文化意義 (Brydon, 2019: 71)；以奧斯陸大學民族誌博物館中，薩米文化籃筐與編織工藝為例，討論知識、物與人之間的互動，主張人的生活史對於物件傳記與典藏有關鍵影響力，有助於瞭解物件的文化價值 (Svensson, 2008: 85-86)；以富士全錄公司的老舊影印機展示為例，探討組織敘事中的非人行動者作用，凸顯物與人共構了組織意義與行動重要性 (Humphries and Smith, 2014: 478-480)。還有學者分析蒐藏品與考古實踐中的性別偏見，如何掩蓋了女性的存在與貢獻 (Heitman, 2017: 128-129)。B. C. Lowman 則研究美國 3 座博物館中的愛奴人藏品，強調物件的物質標記是獨特的個人與文化所有權表現，博物館展示敘事不能只重視起源而忽視使用的重要性 (Lowman, 2018: 46-47)。

除了典藏和展示的物件，博物館的建築本身也是重要的物件，包括了內部空間設計、動線配置，以及建築外觀，都體現了博物館的立館精神、政治目的和運作方式。例如，韓國國立博物館的不同時期建築與博物館化過程，從拆除殖民象徵的舊建築，到保存建築局部並製作展示模型，體現了國家建構、民族統一與正當性的意圖 (Chung, 2003: 240-242)。A. Loxham 則討論英國帝國戰爭博物館北館 (Imperial War Museum North) 的展示與商店的物件

配置，揭示藉由人與物的部署與互動，如何塑造出戰爭的不同敘事。該館建築師嘗試以空間與物質設計激發訪客的不適感，在體驗刻意製造的戰爭記憶中，引導訪客反思歷史 (Loxham, 2015: 524-525)。但是在館內商品展售區中，吻合特定敘事觀點的物件陳列方式，使主流戰爭記憶延伸至訪客購買紀念品回家的行動，卻少了對暴力、民族主義、國家、戰爭與生命的批判性反思 (Loxham, 2015: 533-534)。總之，博物館本身做為一物件，自身也是展示對象，建築本身發揮了教育和溝通功能。

不過，前述有關博物館物件的研究，多侷限於博物館專業人員的資訊製作與詮釋，相對忽略了博物館使用者的經驗和主動詮釋。Latham 嘗試整合資訊類型學、博物館物件研究和訪客經驗，提出將博物館物件視為檔案的概念，試圖呈現物件在實體承載、符號意義及訪客經驗的不同層次 (Latham, 2012: 62-67)。於是，物件意義乃是一種持續對話和詮釋的過程，不同行動者的介入會影響物件的存在、型態、意義和價值。這個觀點不同於物件技術與象徵意義的研究，而是增添了人與物的互動，也避免了博物館由上而下的詮釋權威，並凸顯出物件與意義的動態生成。順著物件所牽涉的社會互動，Casey 則主張「操演」(performance) 概念可以將訪客與環境也納入博物館物件的製作中 (Casey, 2005: 80)。而且，操演以動態概念來理解物質的存續與意義，將人與脈絡涵納其中，故而是物質的實存和象徵之外，必須考慮的第三個向度。A. Pickering 也提出操演做為物的能動性，認為物質文化研究超越語言轉向 (linguistic turn) 之處，便在於關注人與物互動的能動性之舞，而此能動性之舞有萌生、去中心、交纏和可見的特質 (Pickering, 2010: 194-197)。將襲產物視為操演實踐，而不只是物質構成或象徵意涵，也暗示了翻轉權力、改變規範的力量 (West and

Marion, 2010: 281-282)。

社會運動研究中，曾提出文化造物 (cultural artifacts) 概念，也吻合這個立場，其強調在過去不受重視，即使具有動員作用，也被視為次要的文化產物，一旦通過所謂操演的造物化過程 (artifactualization of performances)，則能凸顯文化產物對於社會運動的影響力 (Fenollosa and Johnston, 2015: 73-75)。相對於前述博物館主流研究中，實存與象徵這兩種襲產物定位，操演毋寧是更有助於掌握人與物之關係的面向。

若將實存、象徵和操演的面向延伸至產業襲產領域來考量物的作用，往往可以分別對應於歷史見證、敘事指認，以及社會行動這 3 種模式。實存物做為歷史的見證，例如確證了技術變遷，是最常見的襲產化模式；機具的實存本身在保存與展示中成為歷史事件的見證。敘事指認中的象徵物，乃意味了經由敘事來賦予特定機具象徵性的價值；這在產業襲產實務中，多由專家團隊和工廠員工協作，來確認機具的功能框架。這時候，機具不僅是實物見證，更是使得其所欲見證之歷史或敘事得以推展的象徵，並因而具有了價值。最後，做為操演媒介的襲產物，超越了將機具視為實存見證或象徵指涉的觀點，將機具視為特定社會行動的操演媒介。這時候，襲產化涉及了更廣泛的社會意圖與實作，可能維持既有的社會關係，也可能嘗試轉變社會關係。

二、再思考襲產物：客體化、關係存有論、重新組裝

無論是做為實存的見證、象徵的指涉，還是操演的媒介，襲產物的定位或作用等議題，值得連結到更廣泛的主體與客體關係，以及物的存有論來思考，以便進一步拓寬襲產化物件的思辨。

首先，針對資本主義脈絡下，工廠內

機具與勞動的批判性觀點，很容易聯想到馬克思 (Karl Marx) 的異化 (alienation) 概念，也就是原本是人類為了生存和自我實現而生產，現在卻必須出賣勞動力，並且在工作現場與機具的節奏搭配，生產出不屬於自己的物品，因而有了異化勞動，甚至導致人本身的物化 (李中文譯，2016: 109-116)。再者，勞動中使用及創造的各種技術與物件，成為人類社會演進的動力，即生產力的提升與生產關係的辯證乃歷史變遷法則 (萬毓澤譯，2007: 143-148)。馬派觀點指出了機器與人的矛盾，機器雖然由人發明與操作，卻也取代了人類的部分功能，甚至令人臣服於機器運作，成為資本家擴大剝削勞工的一環，形成社會變遷中內蘊矛盾 (例如利潤率下降趨勢) 的辯證關係。順此，在襲產化脈絡中，我們不應只呈現人類創造產業與技術的變遷史，也要看到機具與人之間的緊張關係，以及這一切捲入資本積累及其矛盾的過程。

不過，米勒 (D. Miller) (1987) 認為這個凸顯人與機器及其產物之間斷裂的異化概念，可能過於狹隘且誤解了概念來源的黑格爾理論。他主張，異化其實在黑格爾來講是更廣泛的「客體化」(objectification) 概念，並且有克服主體和客體二分的意涵。米勒指出：

黑格爾的主體在每個階段都是由一系列過程往前帶動，首先是主體通過創造而延伸了自己，然後，主體覺察到這個創造出來的「事物」顯然是自外在於主體。這也會影響到主體對於外部的意識，而對於原為主體一部分呈現分離狀態而感到不滿。然而，這種不滿也是驅動力，促成對於外部事物的認知，並將它重新吸納到主體之內；現在，主體與做為其創造物而與外部化的事物合而為一，主體也因為這種吸納而有所轉變 (Miller, 1987: 22)。

簡言之，客體化的過程涉及了主體創造物的外部化，也就是自身產物的外部化，以及後續的再度吸納合一。於是，客體化並非單純將人造物視為外部對象，還牽涉到覺察這個外部對象其實是人類產物，以及，這個人類產物必須再度內部化成為主體的一部分。因此，

沒有先存的主體，因為主體總是由吸收它自身客體的過程所構成的。同樣的，客體如果被視為人類的文化發展，就必須反映任何既定歷史階段的人類能力 (Miller, 1987: 27)。

客體化所描述的是主體與客體得以創造出來的關係，這個關係的形成是一種過程，而這種過程總是有所進展。於是，主體創造物的外部分並分離之，實具有正面效應，在後續的再吸納過程中豐富了主體本身，使得主體有所發展 (Miller, 1987: 27-28)。

於是，相較於馬克思所談的異化，以及客體化做為一種斷裂，米勒凸顯了客體化其實是主體和客體相生相隨的創造過程，而外部化、斷裂及再度吸納，則是這個過程的連續環節。在這種觀點下，前言中提到的襲產化脈絡下的轉化與連結難題，就是人類主體及文化 (客體) 發展之必然過程的一環，並蘊藏了創造、分化及複雜化的潛能。換言之，主體既創造又依存於客體之物質性，並且在此過程中持續分化與成長。物件的襲產化則是主體創造客體又依存於客體的這種狀態下的特殊情境；換言之，襲產化物件是檢視主體通過客體而外部化 (賦予襲產物件特定意義和地位)，又將客體吸納於主體 (將襲產物納入主體的構成中) 而增進主體潛能的媒介。

不過，在此一般性的演進過程中，我們需要考察不同的物件或客體化狀態，

或者說，複數的主體和多重的不同客體之間，有著更複雜的各種轉化與連結方式。在這方面，以羅為首的行動者網絡理論 (Actor-Network Theory, 以下簡稱 ANT) 或轉譯社會學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陣營的關係存有論觀點下，對於物的概念化頗值得參考 (Mol and Law, 1994; Law and Hetherington, 2000; Law and Mol, 2001; Law, 2002)。他們歸納出區域 (region)、網絡 (network)、流態 (fluid) 和火形 (fire) 等空間性 (spatiality)，來描繪關係存有論下物體的各種存在樣態，或者說拓樸學 (topology)。

羅 (2002) 主要是以拓樸學的同胚 (homeomorphism) 概念，做為他的論證的基礎。同胚是指在拓樸空間中的同構狀態，也就是某個空間形式即使有所延展、扭曲等變形，但不會斷裂分離，反而保持了所有空間性質的映射，或者說，保持了形狀的連續性。再者，這裡的連續性在分析上，是以能否有效運作來評斷的，因而是以實效來取代本質做為物的存有依據。羅指出，ANT 所謂的物，乃是穩定的關係配置或網絡的效果 (Law, 2002: 91)，亦即物沒有恆定的本質，物是在網絡中促成且變化的，這正是典型的關係存有論思考（存有無本質，而是各種關係的變化生成）。但他主張，物的生成有其空間性，而這種空間性有好幾種，至少有羅提出來的區域、網絡、流態和火形這幾種。不同的空間性，以及座落其間又促成這些空間性的物，彼此難以協調。物的特質正是這種不一致性的反映和促成，是不同空間的不可能及可能性的移轉 (Law, 2002: 92)。換言之，物性 (objectness) 是在不同空間性或拓樸學同胚促成 (homeomorphic enactment) 的交錯中界定的 (Law, 2002: 96)。

所謂區域做為物的空間性，是指各種物體群聚一起，周遭有邊界來區分出內外差異。而且，區域是以相對的三維座標

來界定的地方，或者說，以座標位置來保持其穩定性；物體之間的關係不能更動，一旦改變，就破壞了同胚關係。其次，所謂的網絡是指在區域地圖上，彼此相距遙遠的區位或異質元素，可以串聯在一起。而且，網絡往往仰賴橫跨了區域邊界的那些「不變的可移動者」(immutable mobile)——例如檔案文本或儀器裝置——來相互串接，亦即以元素之間的關係來保持穩定或同胚關係。第三，所謂的流態，是指邊界可以變得模糊或是可以滲透，異質元素之間的關係也可以變化，卻不至於導致完全斷裂。這是一種液態流體般的存在，呈現了混雜、漸變且有彈性的狀態，不會因為缺少某些元素就崩解斷裂 (Mol and Law, 1994)，可以說，流態是「可變的可移動者」(mutable mobile) 的狀態。最後，火形是現身與缺席的同步發生（不斷明滅的火光），是通過突變、斷裂、缺席來產生穩定或連續外型，或者，火形包含了整個看似缺席的大地。譬如某篇英語學術論文之所以存在，仰賴著未明顯現身或隱約閃爍的寫作規範、英語霸權，以及寫作時取用的食物氣味 (Law and Mol, 2001: 618-619)。

舉例來說，一艘船本身是區域（船的構件的相對位置必須固定，否則船會崩解）。船在大海中順利航行，則是網絡（仰賴洋流、風、帆、船舵、星象、港口之間的網絡關係）。船在某些狀況下，可以抽換構件、使用替代物來修補，改變推進方式或航路，甚至訴諸祈禱，來維持其有效運作，這時候可說是以流態來理解。最後，船及其航行仰靠著各種隱而不顯的事物，涵蓋整個海面與大氣流動，以及月球引發的潮汐，由此觀之，船也是火形。

因此，米勒提出的鋪展主體與客體之生成過程的客體化觀點，可以用物的拓樸空間性之關係存有論來補充，顯示主體創造的外部化或外部文化形式（及其具現

物體)，以及被吸納進入主體的物，具有不同的拓模型態。這些不同的拓模型態層層展開，從區域到網絡，自流態至火形，既涵納延展於整個世界，又有著內部的運作方式與穩定性的差異，構成了一個分析視野。不過，我們還是必須注意到，主體置身不同處境，具有不同利益與價值，與客體或物的關係也有所不同，主體對於物的認知也因而有異。例如，人可能需求某些物來彌補自身的缺損或增益自身的能力（補缺），卻厭棄另一些物，因為它們可能威脅了人類利益或被視為無用（王志弘，2002: 16）。於是，產業襲產化中的機具及其保存策略，亦即產業機具轉變為襲產物的過程中的轉化與連結，便涉及了客體化、物的不同拓模空間性，以及不同主體與這些物的差異關係（厭棄或補缺）。為了簡潔起見，作者將這些複雜過程統稱為社會物質性的重組，指涉產業襲產化過程中，人、物、空間之間多重關係的重新組織，藉此來探討機具保存的可能樣態。

接下來，我們就以具體案例來說明產業機具保存的幾種樣態，並檢視其中的客體化（主體創造客體、覺察與客體之間的分離、再度吸納客體）、物質拓模空間性，以及社會物質性重組能否順利開展的條件。

產業機具保存樣態及其客體化議題

觀察臺灣產業襲產的機具設備保存，大致可分為 4 種樣態³。其一是凍結式保存，機械設備雖然部分或整體保存，但已無法或不願使用，往往以厚重油漆塗佈防止鏽蝕，做為過往歷史的標本展示。其二

是拆解式遺存，即清空襲產範圍內的機具設備，僅留下廠房空間，或是連廠房也拆除，僅餘局部物件或書面影像方式留存，以利後續土地利用。其三是持續運轉式保存，相較於前述兩者，主要差異是產業仍在運作中，相關機具仍維持基本生產功能，故機具多能完整保存，並由於持續使用而維護較佳，技術也得以傳承。最後是轉譯式保存，機具設備可能部分留存或消失後重製，著重於技術的挖掘、記錄和再現，並藉由重新詮釋和創造而廣泛連結更多人事物，賦予機具設備新的意義與存在。

為何機具會以不同方式留存？本文將聚焦產業襲產保存樣態的物質面來探討這個議題，並以 4 個場址為例：凍結式保存的十鼓仁德糖廠、拆解式保存的中油高雄煉油廠、持續運轉式保存的建國啤酒廠，以及轉譯式保存的洲南鹽場。這 4 種保存樣態與案例之間的關係並非全然對應，某個類型也可能與其他類型重疊，但作者著眼於以理念型 (ideal type) 來掌握其中的物質特性及影響，以及客體化過程如何在其中展開或難以展開。

一、凍結式保存：機具成為外部凝視對象

十鼓仁糖文化園區是十鼓擊樂團進駐廢棄多年的臺南仁德糖廠，藉由藝術表演、景觀再造、體驗參與、遊憩設施、歷史展示等手段，予以活化再生。臺灣製糖產業由於不敷成本，臺糖公司陸續關閉各地糖廠，目前僅有善化與虎尾糖廠尚維持本地原料製糖工作。糖業陸續停產後，多年來在民間團體、政府及臺糖資源投入下，保存了包括已成為臺灣糖業博物館的高雄橋頭糖廠，以及烏樹林、善化、溪

³ 產業襲產保存樣態並非只有本文列舉的 4 種，尚有移地保存、重組保存、再利用保存、敘事保存、地景保存、影像保存等各種模式。雖然可以細分出更多類型，但大致不脫本文列舉的 4 種主要形態。基於本文探討機具襲產化的主旨，作者僅就最常見的典型樣態，視之為理念型來探討機具物質性的作用。

湖、花蓮、蒜頭等糖廠，並持續推動糖鐵復駛、日式宿舍修繕使用、旅遊體驗與文創商品等再利用方案。然而，糖廠保存再生仍有極大調整餘地，姑且不論體制、人力和資源配置問題，各糖廠以糖鐵火車、導覽、冰品及創意產品販售為主的類似操作，其文化內涵、特色和市場區隔模糊不清，遊客在初嘗新鮮感後，缺乏繼續到訪的動機，使各廠營運壓力日增。至於糖廠機具設備除了部分已拆除，僅餘建築空間外，完整保存者如何接合整體再生方案，也是難題。

不過，仁德糖廠的再生操作有別於前述臺糖自營廠區，而是民間藝文團體在尋覓表演與練習空間之際，因緣際會主動爭取經營。十鼓擊樂團進駐仁德糖廠，相較於其他營利團體，確實更本於發揚藝術文化理念。十鼓擊樂團黃美智總監於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圓夢—打造鼓的故鄉：文創園區的規劃與經營」演講（2015年5月12日）時指出，當初進入荒煙漫草的糖廠，由團長帶領團員和志工親力親為整理，以身體勞動連結這個新環境，避免其他襲產再利用案例經常止於空間利用，卻無法建立與廠區的切身情感和認同。宛如親手打造家園般的勞動參與，使得糖廠再生過程反饋於十鼓團員的藝術創作表演，也延伸了糖廠襲產的意義，令十鼓與糖廠密切融合。除了十鼓擊樂團的努力外，龐大的糖廠空間也徵求景觀等其他專業協助改造。例如十鼓與藝術家劉國滄合作，極具巧思的將糖廠遺留的產業空間陸續改造為適合展演、排練、休憩、極限活動、餐飲、停車及購物等多功能用途，成為提供多重體驗的文化園區（王巧燕等，2013: 11-22）。

從生產基地轉化並重新連結成為襲產的過程中，十鼓仁德糖廠著重擊鼓藝術表演、美學地景營造，以及新奇的遊憩設施，留存的機具遂成為支撐新地景設計的

元件，附屬於地景而不再是推動生產的主角。當機具的物質特性與美學地景規劃不協調時，就會被排除於糖廠的新運作邏輯之外。正是這種以美學地景取代機具生產的新框架，導引了凍結式保存。機具轉變為視覺凝視或互動遊戲體驗的對象，而其體現的技術和勞動意涵，則成為浮面片段的符號解說。於是，仁德糖廠的機具雖獲得相對完整保存，但僅止於靜態陳列。事先規劃的路線引導遊客參觀，定點設置解說牌或影片說明機器名稱功能，機具在燈光設計下成為美學化的凝視對象。這種凍結式保存體現了物與物，以及人與物的不同關係。

在物與物的關係方面，不僅個別生產機具在觀光及美學凝視下化身為具象徵性的文物，原本在生產活動中密切協作的各種機具，也分拆為不同定點的個別展示品。在人與物的關係方面，不論是對於原本的糖廠勞動者，或是十鼓進駐後的新勞動者和遊客而言，這些機器已是糖廠歷史的展示品，不僅已非園區經營的主軸，也無法體現勞動經驗。例如過往生產情境中，勞動者必須動員各種自然和人造物來達成生產目的，因而有涉及機具物件的多重身體經驗，如製糖原料——甘蔗的種植、採收、運送、蒸煮和蔗渣清理等身體實作。相對的，在目前保存狀態中的身體經驗，則是穿越天空步道的美學化奇觀，或是參與極限溜滑梯等體驗，糖廠機具則不再直接介入人類身體實作，而是成了符號化景觀的背景。再者，仁德糖廠在十鼓擊樂團進駐後有了新的支持系統，包含水電、裝潢、泥作、鐵工與油漆等等團隊，藉此建造和維護美學地景及藝文展演空間。相對的，原本維護製糖機器的專業工匠則退場消失。因此，即使機器要以動態運作方式展示，也缺乏能夠掌握機器功能和安全性，以及解說機器相關知識、價值與故事的員工。

總之，糖廠機具原為生產工具，在仁德糖廠由藝文團體主導，標榜文化保存下，轉化為凍結式保存的展示物。於是，機具同時是糖廠歷史的見證式文物，也整合進入美學化的敘事地景中，成為特定藝文價值的象徵指涉，但兩者都僅以視覺凝視對象的方式存在。在消除生產場域中甘苦交雜、主客體相互轉化的多樣勞動經驗，進入美學消費場域後，在遊客的感官體驗中，機具僅僅只是由襲產化和美學化框架予以外部化的新奇對象，而難以被吸納成為主體成長和複雜化的要素。

二、拆解式遺存：零散化的文物

高雄煉油廠承繼 1942 年設立的日本海軍第六燃料廠，戰後中油公司接手重建，定名為高雄煉油廠（以下簡稱「高廠」），是臺灣現代化煉油事業開端，於 2015 年停工關廠。高廠共有 46 座工場，涵蓋石油煉製過程的各項產製程序，從前端的原油煉製，到末端的環保回收。高廠對於中油公司的重要性，也可由該公司於高廠關廠後浮現的用語一窺：「後高廠時代」成為探討中油發展進程的專有名詞（許如凱，2015: 20）。衡諸各工場生產模式與類型，即使歷經七十餘年而有更迭拆建，不僅未減少其豐富度，反而隨歲月流逝而更添多樣性，留存從日治迄今的不同時空與技術模式的生產設施。但 2016 年高廠開始清查保存產業襲產之前，已持續大規模拆除轉售煉製工場與相關機具設備，僅有少數動力基礎設施、日治遺構、地標建物和儲運設施倖免。2021 年 12 月，高雄市都市計畫委員會通過「高雄煉油廠轉型楠梓產業園區都市計畫變更案」，將高廠內 29.83 公頃特種工業區變更為產業專用區，預定供台積電設廠之用；其他土地則主要預定做為循環技術暨材料創新研發中心使用（林巧璉，2021）。

雖然高廠本身設有文物館，但不僅外

人難以獲知相關訊息，不少高廠內部員工也不清楚有此館舍，更別說進入參觀。而且，相對於文物館以靜態保存了少許拆卸機具及影像，占地數十公頃的遼闊生產區域，還存有龐大且亟待清查的機具設施。這些設施往往量體龐大而難以移動，彼此緊密銜接，構成大型技術系統，甚至因為存在化學物質或本身設備特性而有危險性，拆除標售也需要高廠員工細心處理，方不致造成工安意外。中油公司面對龐大設備與土地，最初仍希望爭取後勁地區及高雄市政府的諒解，維持生產運作。但由於污染問題，以及與反五輕運動長年來的緊張關係，仍舊維持停工關廠承諾，並預定做為未來新產業的用地。

中油公司對待高廠這些具保存價值的產業襲產，雖然應文化部要求而進行清查，但高層政策其實已定調拆除轉售，不惜揚言對倡議保存者記過處分。然而，這卻非當時許多高廠員工的想法，長年於高廠服務、實際從事生產的多位資深員工，除了參與產業襲產清查培力計畫，也會自行記錄、調查與蒐藏高廠勞動生產相關歷史和物件。不論是基層操作員、領班，或中階工場長與部門經理及與高廠關係緊密的第一線勞動者不僅對生產環境如數家珍，也有著濃厚情感，對其寄予自身、夥伴和產業的共生經驗。在拆除轉售的處理方式下，主要工場生產區的機械設備與廠房已陸續消失，僅殘存某些遺跡或留存部分物件，體現為一種拆解後零散化的文物保存狀態。

就人與機具物件的關係而論，過往高廠中人與物緊密相連的勞動生產環境，在停工拆除的劇變下可謂人去樓空，僅餘殘跡。過往即使是異化勞動中也仍存有的客體化過程（例如展現為人對機具的適應，以及人對機具的調整改造）已然崩解。隨著物質形式的消失，人員、技術、情感、空間在勞動運轉中的組合，也隨著消散，

具豐富情感與記憶的資深員工紛紛退休或調離，人際關係隨之疏離弱化。就物與物的關係而論，由各種機具設備組成的龐大石化工業生產系統，拆解為殘存機器的孤立展示，機具之間的系統關聯也就消逝了。「後高廠時代」做為中油公司的新詞彙，除了時序遞移外，也體現拆解式保存下的襲產框架，相對於原本龐大的工業複合體，顯得格外渺小而零碎。

然而，正因為煉油廠的機具設備數量及體積龐大，彼此綿密串接且具有高度危險性，在脫離生產功能、缺乏支持系統、污染整治困難，以及人員遣散退休後，機具很難納入保存框架。首先，在高廠煉油生產環境中，產能或績效是除了工安外最受重視的項目，例如北煉組第二低硫燃油工場於工安事件後再次啟動，並創造高產值的表現，就為中油員工稱道（尤筱瑩，2015: 24）。相對的，機具設備在脫離生產功能後，存在的必要性便大幅降低。位居高鐵和捷運附近，具有高度開發潛力的高廠土地上體積龐大的機具設備，便成了新開發願景的累贅。於是，清空大型機具設備，僅留存小型物件和檔案文件，成為其襲產化的推進方向。

高廠的機具在運作時需要龐大的支持系統，如實驗、聯繫、檢測、維修、品管與工安制度，各有負責單位，以及具備石化或機械產業知識技術的專責人員，在系統性運作中確保機具設備的安全和高效生產。但高廠關廠而局部納入襲產化之際，支持系統無法隨之留存，勞動者多已退休或遷調他廠，也沒有專責單位處理機具劣化和維修問題。在生產脈絡中可以獲得系統支撐的物質安全和維修，在襲產化過程中就成了燙手山芋，拆卸分解也就成為最簡便的處理方式。再者，相較於前述的糖廠，高廠內除行政區外，許多工場區的土地已是公告劃設的土壤污染控制場址，必須整治常年煉油產生的污染物，處理一

定深度的土壤污染物。然而，機械設備與廠房的存在將使得土壤整治難度提升，耗費大幅增加。於是，以土地再利用為主導邏輯的利益、系統維護的崩解，以及整治工程的需要，都弱化了機具設備的保存可能。總之，在脫離生產功能，邁入襲產框架的過程中，諸多因素促使高廠淪為拆解下遺留的零散片段化的文物保存，並且遠離了一般民眾的視野。這些殘存機具連外部化的凝視對象都不是，而是脫落在群眾視野之外的遺孤，是生產的客體化停止後，無法拼湊重組、也難以再吸納的殘片。

三、維持運轉式保存：生產客體化的襲產化延伸

1920年建立的建國啤酒廠（以下簡稱建啤）是臺灣第一座啤酒工廠，從日治到戰後，不僅逐漸擴大產量與提升品質，更屢獲獎項，成為臺灣啤酒產業翹楚。1990年代後，遭遇開放進口啤酒競爭與民營化成本考量，面臨關廠及土地繳回的困境，在樂山文教基金會為主的文史工作者介入下，展開爭取文化與工作保存的行動。雖然歷經包含停料、停工、抗爭與協商等困難，甚至公賣局不惜違反行政院決議，貿然拆除包裝機與儲酒桶等機具設施，但隨著臺北市指定古蹟，以及行政院維持少量生產的政策下，終以持續生產的活古蹟方式留存，規劃為啤酒文化園區（潘欣榮，2007: 41-56）。建啤的襲產化很特殊，是臺灣少見爭取勞動權的襲產化行動，試圖藉由保存廠房與機具，捍衛工作權，體現襲產化做為抗衡資方決策的效果。特別值得注意的正是機具的保存，令生產體系得以延續，而持續使用的保存模式更令技術得以持續中介著人和物的關係，延續客體化過程，從而保障勞動權益。

建啤的襲產化，使得勞動者轉變為結盟抵抗的工人社群，並且與文史保存團

體合作。在生產邏輯中，釀酒工人付出勞動力賺取薪資維繫生存，個別勞動者相較於國家公賣局或民營化的資方而言，是工廠中分散而孤立的管理對象，彼此間也存在著績效與能力的競爭關係。但是在襲產化過程中，勞動者以工會為代表，收攏於結合工作權與文化保存的運動框架中，雖然個別勞動者對文化保存有不同想像和認知，但是以相對溫和的文化保存來爭取工作權，卻是共同的目標，使得原本分散的勞動者得以在論述、實踐和情感上團結起來。

建啤維持生產的運轉式保存，使機器兼具生產和文物展示功用，員工除了是勞動作業者，也延伸出擔任導覽解說者的身分，亦即在維持生產的客體化外，延展出新的物與人、物與物，以及人與人的關係。首先，釀酒工作的勞動經驗仍在，但是在襲產化的啤酒文化園區中，退位至廠房與機具的文史價值旁。雖然生產持續進行，但這時候的生產已不只是產業邏輯，更是以特殊歷史敘事及襲產化物件為核心的展示性生產。尤其在特意設計的導覽中，特殊的機具往往是解說重點和特色，勞動經驗則退居於襲產觀覽的視角後方。

另一方面，機具由攫取勞動剩餘價值的工具，轉變為捍衛工作權的襲產，由生產物轉變為襲產物，既是生產工具，也是襲產見證，更是文史價值和工作權益的象徵指涉物，乃至於動態展示的操演媒介。不過，雖然機具仍有攫取剩餘勞動的工具性，但在保障權益的襲產化操演下，襲產物的見證和象徵意義，已然大於實際生產用途。同時，因襲產化而納入導覽目光的機器，其個別特色也會格外凸顯，某個程度上從原本的生產程序環節中象徵性地脫落。不過，建啤維持生產的保存方式，也使得既有維修體系可以支撐機具修繕，人力技術或修補材料都有一定程度的能量。雖然相較於早期完全自製自造，已有許多

工作委外辦理，但生產活動的持續有利於襲產化的機具與廠房存續，更重要的是，建啤的支持系統不僅止於維修，更延伸出詮釋展演的新功能，提升了保存舊機具的必要性。換言之，建啤的特色是機具和廠房持續使用，而且老機器在襲產化脈絡中成了歷史、記憶、氛圍和工藝的象徵，因而其物質性是重要保存對象，並藉此抗衡先進製程及新機器。

再者，原先機具與勞工之間有著相互調節，又捲入異化剝削的張力。在襲產化邏輯中，機器雖然仍非勞工所有，卻為了保障工作權而轉化為文物，勞工和機器成為某種命運共同體。可以說，勞工本身也隨著機具一起襲產化了，成為展演式生產的環節，甚至也是被凝視的活文物。此外，釀酒生產需要豐富的製酒經驗，包括身體實作與感官經驗，來調動或權衡各種因素，才能製造符合品質又別有風味的啤酒（以襲產化來避免老舊機器因為低效率而遭淘汰，正需要搭配少量生產的地方風味啤酒）。襲產化之後，這種製酒的身體感官經驗，也會延伸或轉換成為導覽敘說的詮釋互動，對來訪者解說生產流程的溫度、壓力、原料、麴菌等，跨出了勞動者的社群關係。

如同中油高雄廠，建啤也位於都市核心區，土地開發利益龐大，同樣有開發和保存的張力，亦即龐大機具和土地再利用的衝突。這既是當初關廠的原因之一，更是機具保存的難題，顯見於保存倡議初期，公賣局迅即拆除標售部分機器的現象。然而，建啤在臺北相對發達的文史保存運動及組織能力，以及文化治理模式的崛起下，推動臺北市政府指定多棟建物為古蹟，相當程度降低了開發壓力，轉化為寄望啤酒文化園區的經濟效益。工作權保障爭議的團結動力，以及都市選舉的競爭脈絡等，也提供了相對有利的保存條件，形成特殊的持續運轉式保存，展現出生產

客體化之上疊覆新的襲產客體化的模式。

四、轉譯式保存：擴張式的客體化

洲南鹽場是文化建設委員會產業文化資產再生計畫推動下，由布袋嘴文史協會經營復曬的鹽場。相較於同時期推動復曬的鹽場，洲南鹽場除了是民間團體主導外，以深度體驗參與及維繫原鹽業技術工法的鹽田保存、修復與再生經營方式，也有別於其他以觀光地景營造為主的鹽場。秉持貼近地方歷史、社區活動及鹽業文化的理念，除了洲南鹽場的復曬，經營者更企圖連結老鹽工的勞動經驗、社區宗教信仰、社區產業、環境教育、技術傳承、藝文團體、學校戶外教學、小旅行及工作假期營隊等社群經營與運作方式，以襲產為媒介而轉譯 (translate) 至其他領域，可稱為持續擴張的客體化。洲南鹽場的保存與再生中，老鹽工與文化工作者的協作，是營造不同於其他鹽場模式的關鍵。從廢曬到復曬的襲產化，若無老鹽工參與及文化工作者的轉譯，恐輕易淪為視覺意象式的地景塑造，而缺乏鹽業文化的動人知識、經驗和生命力。

洲南鹽場的轉譯式保存，使鹽田復曬成為連結多樣行動者的場域，也促使鹽田的物與人、物與物、人與人的關係產生了變化。在物與人的關係方面，我們可以見到單調的產鹽勞動，轉變成為多樣的文化實作與再現。過往曬鹽產業中，鹽工以各種工具為媒介，將海水曬成結晶鹽，從事日復一日的生產勞動，參與者也限於鹽工、鹽田和資源化的自然。襲產化邏輯中，鹽田復曬雖仍以鹽工技術為核心，卻動員而串連了各種異質行動者，過往未曾重視的動植物和設施，也在文化產業運作中成為重要生態指標。這些連結與動員的過程，通過各種論述、影像、展演與身體實作，散佈於自各方來到鹽田的體驗參與者。人與自然的互動，也從先前順應環境

的生產模式，轉變為積極動員自然，使其成為鹽田復曬的文化生態象徵。這樣的變化影響了人的身分及人群關係的衍伸，像是鹽工轉變為導覽員、教育者和展演者；消費者同時是學習體驗者；文史工作者則轉變為文化工程師或文化轉譯者；社區中的其他農漁產業者，也通過結盟合作而成為地方產業文化的共同經營者（楊凱成，2011: 20-21；沈錡美，2015: 21-23）。最後，鹽的表現也由單純的食用鹽與勞動鹽田，轉變為文化鹽與文化鹽田，賦予各種不同的意義，即使都是日曬鹽，卻已進入不同的產製脈絡、意義和樣態。換言之，這裡的襲產化遠非標本化，而是以鹽和鹽田為操演媒介，形成轉譯的觸媒場域，並將主客體的相生相隨持續擴展出去。

轉譯式保存的廣泛動員、連結和擴展式客體化，是洲南鹽場經營的特色。相較於前述3個案例，洲南鹽場擁有一些特殊條件。首先，洲南位處臺灣西南沿海偏鄉，土地開發壓力甚小。再者，曬鹽所需機具，包含竹釘、水車、小耙、鹽收仔、畚箕、鹽壘、草棚、扁擔、鋤頭、馬蹄槓、石輪、滷勺、篾挑、木拍、波美比重計、風車、瓦片等（謝依宗，2010: 21-25），量體不大，大多可以輕易移動。至於占地較大、無法移動者，如滷水池、結晶池、蒸發池等鹽田組成，本身就是土地的一部分，只是在曬鹽生產中區分功能而整建。換言之，各類器具及其部署，在鹽田中比較容易重建，也相對容易維持。當初廢曬後，鹽田本已失去其支持系統，鹽田瓦盤、土堤、水車等皆損毀。布袋嘴文史協會進駐後，邀集老鹽工以傳統工法、材料，儘量維持生態友善的方式來修復與復曬。原本中斷的人與物的搭配關係，不僅藉由鹽工經驗而再度傳遞，還在轉譯式保存下往外擴張，令鹽田與鹽工、文史工作者及體驗遊客建立了各種連結，乃至因應新需求而產生協商式的新實作。

例如，分隔不同鹽田的土堤，鋪上黑色碎石並增加寬度，有別於傳統的狹窄形式，成為適合參訪者行走的步徑（楊凱成，2011: 20-21）。

當然，一如建啤的情形，活化運轉中的鹽田，也會因為納入襲產框架而彰顯文化生產功能，超越了原本的產業功能。鹽的產量、成本效益和銷售，都是次要考量，鹽業文化如何延續與再造，才是核心。再者，在文化產業的經營模式下，意味著某些物件會被特別凸顯而成為展演和保存對象，而不是所有鹽田相關事物都能獲得同等重視。例如龍骨水車的技術傳承、高蹺鴿、吳郭魚、濱水菜等動植物生態，被賦予新價值而凸顯（楊凱成，2011: 7-28），相對的，扁擔、畚箕、瓦片等物件，則較少獲得注目。

表 1 綜述了 4 個案例的機具保存樣態、襲產物定位，以及客體化特質。簡言之，這些產業遺址的襲產化差異甚大，關鍵在於其座落的區域特質，是否面臨高度發展壓力，以及是否有足以抵抗關廠再開發政策的保存運動。再者，產業機具和建築的特質，是否適合保存或在襲產化、文創化的框架下再改造利用，也是重點。相

較於煉油廠的機具設施，糖廠和啤酒廠的設備與建築物，就比高廠的設備更容易納入襲產框架中。最後，襲產化或保存方式是以藝文活動為主體，或是以地方文史、環境教育和社區營造為主軸，也有很大的差別，顯現於仁德糖廠和洲南鹽場的差異。不同條件下的保存模式，也就意味著原本生產脈絡下的客體化（異化勞動中的主體創造、外部化與再吸納）會因轉化而消失，或變身為外部化的襲產，或是往襲產化延伸，以及擴張到其他領域等產生不同的狀態。

襲產物的關係性存有觀

如前文所述，客體化的思維中，對於物本身差異狀態的討論不多，因而我們可以援引關係存有論的觀點，指出物的不同空間性及其存有狀態，亦即區域、網絡、流態和火形等。這些不同的空間性，其實透露了我們對於襲產化，特別是襲產化的物件如機具，可以有不同的認知與相應的操作，從而令這些襲產物進入不同的拓樸空間而存在。

區域式的襲產物，可以理解為具有

表 1. 產業機具襲產化的保存樣態、襲產物定位與客體化

案例	仁德糖廠	高雄煉油廠	建國啤酒廠	洲南鹽場
區域特質	城郊	市區	市區	濱海村落
機具特質	生產線機具、特色建築構造	量體龐大的繁複系統，有工安與污染問題	生產線機具、特色建築構造	小型、分散且可移動的器具
保存樣態	凍結式保存	拆解式遺存	持續運轉式保存	轉譯式保存
襲產物的定位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糖廠歷史的物質見證 藝文價值的象徵指涉 美學化地景的凝視對象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脫落於視野之外的殘餘文物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酒廠歷史的物質見證 文史價值與工作權益的象徵指涉 組織動員的操演媒介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鹽場歷史的物質見證 文史與生態價值的象徵指涉 地方營造的操演媒介
客體化特質	生產客體化的消散；襲產外部化	生產客體化的消散	生產客體化的襲產化延伸	以襲產化為基礎的擴張式客體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明確邊界、構造穩固且完整的物件，但是一旦無法維持穩定構造，就可能喪失其功能、意義和價值。在主流觀點中，大多數的襲產物，小至手持器具，大到整棟建築物或自然文化地景，都被視為區域式的存在，若有破壞缺損，就形同價值和意義的折損。其次，網絡式的襲產物則是以穩定的網絡關係為其存在特徵，這意味了彼此分離的不同物件之間的穩定網絡化關係，構成了物的狀態、運作與存在。鐵道設施、運河、水道網絡，以及其他包含廣大範圍的各種異質元素成套納入了襲產框架，大抵都有這種特徵；個別元素或許是區域式襲產物，但整體而言就轉變為網絡式襲產物。

第三，流態式襲產物是以能夠變動的邊界為特徵，這往往意味了即使更換元件或擴大範圍，只要能夠依其原設定目標運作，這個物件依然可以算是存在。前述區域式襲產物破損，而以其他新材質嵌入修補，或者，歷史建築的修復採取新式工法和建材，但維持某種既有形制，甚至連形制也有所改變而有利於維修和再利用（例如，容留現代管線和空調的空間需求），只要持續被接受是襲產，就依然以襲產地地位或角色而發揮作用。

最後，火形式襲產物是一種徹底而幾乎沒有邊際的關係性存有論，這是將一切有助於當前某物（無論是做為區域、網絡或流態）之存在的、位於先前時空中的元素及其變化軌跡，都視為掌握該物之存有的一環。就此而論，世間所有事物都糾纏在一起，並且持續變化。我們甚至可說，火形襲產物的觀點，使得每件事物都成了襲產。因為一方面，它們都是千古以來不同時空中的異質元素匯集的結果，累積了亙古以來的作用痕跡，即使目前已經無法辨識。另一方面，它們即使繼續改變，遭受了拆解、破壞、改造，也無法抹滅它們做為後起物件先驅的「此曾在」，換言

之，它們為後繼者所承襲。因此，任何一個當下做為關切對象的襲產物，既承襲了數不清的先驅，又會轉化成為數不清的後繼者，它其實只是歷史長流中，一個人為的暫止。這樣的火形觀點對主流襲產概念，是極大的挑戰，特別是拆解了真實性的價值與判準，將其轉化為糾纏不清、持續變動的時空之流。

簡言之，在火形觀點下，任何事物都是襲產（都是先前時空軌跡的產物），卻也因此導致襲產概念的失效，或者說，無法以是否納入襲產體制來界定襲產。再者，由於關係存有論中的物，無論是火形，或是區域、網絡和流態，在描繪物的存有空間性之餘，很難去處理在襲產化過程中會涉及的價值評斷（保存和再利用的價值抉擇），因而運用於襲產領域時也有其侷限性。為此，作者提出「賦予價值的關係存有論」，是用來理解襲產較為適當的架構。於是，基於「賦予價值的關係存有論」立場，作者並不認為物的存有僅繫於無邊無際的時空軌跡，而是比較接近前述區域、網絡及流態等，具有不同程度的可變動邊界特質，而此邊界既取決於物質特性，也仰賴人類在襲產化實作和論述上的介入，並藉此賦予其特定價值與因此而來的穩定性（亦即，納入襲產體制）。於是，襲產化乃是具彈性邊界的物件與社會行動相互作用的過程和結果，這也正是襲產化做為社會物質性重組這個概念的核心內涵。

基於此，我們可以檢視襲產研究的核心概念，也就是經常被視為價值論述核心的真實性。早期國際公約多聚焦於物質的真實性，其後隨著襲產維護或修復在不同地區所遭遇的挑戰，而開始著重在文化多樣性下的真實性，亦即在不同社會文化脈絡下的價值判斷，也影響了真實性概念的演變。除了諸多國際憲章公約逐漸強調歷史真實性，勝過於原始真實性，故而以物

(object) 為主軸，關照其在物質 (physical) 和情感兩面向的真實性 (文芸、傅朝卿, 2011: 33-34)。特別是《奈良宣言》的提出，雖然強調真實性和價值評估的連動，可在共識體系下尋求地方及動態的維護，但可逆性、可辨識性、最小干預等，仍是真實性的核心原則 (文芸、傅朝卿, 2011: 39-40)。這些觀點也體現在以文化意義、生活史及技藝價值為焦點，在基地、基礎及構築等建築形貌之外，延展真實性的維護或修復 (徐裕健, 2007: 151; 張崑振, 2012: 48)。或者，承襲《奈良宣言》的觀點，面對襲產隨時空環境變化、主體位置差異，以及資料來源的信實等，改以道地性取代真實性，亦即採用不同的 Authenticity 翻譯語境變換，避免僵化或西方中心的觀念與實踐謬誤 (王玉豐, 2002: 61)。

不過，上述真實性概念雖納入不同的學科、社會文化範疇及場域價值，但仍是基於建築史及具有嚴格階序的真實性思維模式，是無法處理真實性做為空間規訓治理和資本積累在權力關係上的反思 (邱淑宜、林文一, 2019: 6-8)，也難以面對以勞動文化及自然生態為主的非建築襲產的實踐。特別是農業襲產系統的概念與類型的出現，呈現以地方情感與歷史脈絡的文化多樣性來衡量真實性的觀點，兼顧襲產論述詮釋與可證明性 (張育銓, 2016: 206-208)。不過，此觀點仍侷限於文化多樣性與可證明性的概念或原則限制，但更重要的考量是在農業勞動、在地知識、水圳營造、自然環境、產銷體制、襲產論述、經濟收益與社會正義的整體文化實踐。以整體文化實踐來看待真實性，在物質或論述層次之外，需將人—勞動的社會行動也納進真實性範疇，方有助於掌握動態變化的真實性。甚至，若將襲產視為生命體，則有著：過去—始終如一；現在—現代詮釋；未來—未來轉譯等，具生命的真實性，體現為人／建築／自然／文化交

融互動的文化場域質感 (林崇熙, 2012: 62-67)。

以上有關真實性的討論頗具啟發性，呈現了物質材料、歷史更迭、文化多樣性、勞動生活實作，以及文化場域質感等不同觀點的轉折。本文提出以拓樸空間性來詮釋襲產物，則提供了統攝這些真實性意涵的物質存有論基礎。若分別以 4 種拓樸空間性來理解襲產物的真實性，那麼，區域物狀態下的真實性，著重於物的邊界和構造穩固性，即傳統襲產觀點下的物質延續概念，是以持續維持型態存有來評斷的真實性。其次，相較於區域物的穩固性，網絡物則體現為網絡關係的互動、連結和變化，這既非區域物的穩固真實性，也不同於歷史真實性的時間序列變化，而是以網絡中的互動關係來評斷真實性。第三，流態物強調的是邊界本身的流動特質，特別是在維持特定目的、功能和作用下，物的存有乃體現於持續調整的邊界；因此，若有所謂的真實性，必須以邊界調整下的持續作用來評斷。最後，火形物包含了當下往前回溯的所有元素、軌跡或痕跡的一種無邊無際特質。任何詮釋、理解或變化，都可以視為真實性之所依。然而，就此而論，火形似乎不太適用於詮釋襲產物的真實性，因為襲產總是涉及特定價值和意義的賦予，並因此而劃定了特定邊界，但火形卻無限延展而至幾乎無邊無界，也無從主張其真實性的依據。因此，火形的關係存有立場，與其視為某種襲產物的特殊樣態，並徹底拆解掉真實性概念，不如視之為應該探索襲產物之演變痕跡的一種提醒。總之，物質拓樸空間性的思考，引領我們看見更多樣的物質存在狀態，以及相應的真實性理解。這可以是複雜化真實性意涵，以及重新理解襲產物的重要策略，但此策略仍受限於襲產價值的賦予和詮釋，而非可以無限延伸。基於此，本文的觀點乃是「賦予價值的關係存

表 2. 襲產物做為區域、網絡、流態與火形

案例	仁德糖廠	高雄煉油廠	建國啤酒廠	洲南鹽場
區域	從生產流程割離出來的單一機具，並予以美學化	文物化展示的殘餘機具與檔案文件	從生產流程割離出來的單一機具，並予以襲產化	復曬鹽場中的各種仿製工具，有類似形式與相同功能，但非文物
網絡	糖廠個別機具和廠房與原生產網絡斷裂，重新連結於文創園區的新藝文與遊憩網絡	機具和廠房清除，原有生產網絡消失	啤酒生產網絡持續運轉，另外疊加了襲產導覽與文創消費的網絡	鹽場生產網絡以文化復甦、生態保育與地方振興的型態重組網絡
流態	機具徒留其形，已無法依原樣運作，舊流態消失，機具成為新流態的一環	機具拆解而無法運作，流態消失	舊機具持續運轉，仰賴襲產文創資源來維修，令啤酒生產線本身成為流態	以體現於老鹽工的經驗來復刻工具和身體勞作，令鹽田本身做為流態而存在
火形	機具仍留存糖廠記憶痕跡	殘餘機具和檔案仍留存煉油廠痕跡	運轉中機具仍留存過往時空痕跡	新製工具通過象徵敘事與人類勞動而召喚且創造記憶痕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有論」。

如果以這 4 種不同的物存有狀態來重新理解前文的 4 個案例，我們可能獲得不同的見解（表 2）。首先，以區域這種常見的襲產物存在而論，仁德糖廠和建啤都擁有襲產化的機具，只是前者已不運轉，後者仍在運作，但相同的是以襲產物來看待的話，都傾向於將其視為獨立個體，也就是自成一格的區域物，創造出邊界並據此來加以評價或詮釋。相對的，以區域觀之，高廠的文物是以殘餘機具和檔案文件的型態存在，而洲南鹽場的曬鹽工具多為復刻版的新製品，形式和功能相同，但非鹽場做為一級產業運作時的留存物件。因此，高廠和洲南鹽場的區域物，就主流觀點的真實性而言，都有所缺損，前者是殘餘和文本再現，後者是再製品。接著，以網絡觀之，我們可以觀察到仁德糖廠和高廠原本的生產網絡都已經消失，只不過前者的機具和廠房重新連結至文創園區這個新框架下的藝文和遊憩網絡，後者的網絡則在拆毀後不復存在，未來的新土地使用將掩蓋其遺跡。相對的，建啤的生產網絡持續運轉，但是賦予新的襲產導覽和文創

消費的新功能與意義，使得這個網絡變得更複雜。至於洲南鹽場從廢止到復曬的過程，乃是以文化復甦、生態保育和地方振興等新主軸，來重組曬鹽的網絡，並使得整個鹽場及其活動成為網絡狀的襲產物。

第三，流態這種拓樸空間性的特質，格外凸顯出為了有效運作而擴大物的邊界，或是更換元件以利持續運作。那麼，拆解的煉油廠已無法運轉，而仁德糖廠的糖業生產功能也已消失，但機具成為新的文創園區運作流態的一環。建啤的舊機具則因為納入了襲產和文創的流態而獲得維修，令其得以持續啤酒的生產。洲南鹽場更是以新製的工具與體驗式的勞動，支撐起曬鹽運作的流態，但其意義和內涵已大為不同。最後，從襲產做為火形物的徹底關係存有論立場來看，任何事物都銘記了先前時空中，有助於促成目前狀態萌生之事物的軌跡，無論其多麼的微渺。因此，糖廠、煉油廠、啤酒廠中的大小機具，無論是否完整，無論是否還在運轉，都有過往時空的遺痕。至於洲南鹽場雖然是新製的工具，但有效建立起為了不同目的而曬鹽的身體操演，在通過象徵敘事與人類勞

動來創造新記憶的同時，與過往記憶相互輝映。然而，如前所述，這眾多導致當前狀態的痕跡，在襲產化框架下並非同等重要，而其重要與否的評斷，正來自襲產化的價值賦予，並且蘊含著襲產價值的爭辯而形成了襲產政治場域。

結論：襲產是社會物質性的評價性重組

綜言之，本文以產業機具為例，聚焦於襲產化的機具物件的定位，包含了做為歷史見證的實存物、做為價值敘事的象徵指涉物，以及推展社會行動的操演媒介物。這些不同定位透露了轉化與再連結的襲產化，衍生出相應的不同保存策略。作者進一步援引客體化及物的拓樸空間性觀點，試圖對於各種產業機具保存模式，提出不同的理解，進而主張經常涉及價值爭議的襲產化過程，乃是社會物質性的重新組裝。本文也兼顧襲產物的邊界彈性和可滲透性，以及襲產化價值賦予所範定的界線，提出襲產物的「賦予價值的關係存有論」立場。

如同前文的討論，期望保存的物件所牽涉的物質性，除了物件本身的特性，也涉及物件所在的產業脈絡，以及廠場所在的空間位址，對於保存策略有很大影響。高廠、十鼓仁德糖廠、建啤及洲南鹽場，前三者是高度機械化的生產線型態的產業，洲南鹽場則是高度仰賴人力的一級產業。重化工業的高廠又不同於糖廠及啤酒廠等輕工業，故而機具在後生產狀況下的保存條件，大為不同。

就空間而論，市區、城郊和鄉村的發展程度和推動力不同，要有高強度的保存運動（例如建啤結合了保存與工作權的抗爭）方能抵擋開發的壓力。然而，保存的再利用既是著眼於持續經營的資源，也將襲產物置放於不同框架中，因而改變了

其意義。例如，十鼓仁糖案例中，機具的奇觀化與符號化展示，雖然賦予舊機具新的象徵意義，也使襲產價值從屬於遊憩價值；又如建啤案例中，機具的保存維繫了工作權，但襲產化的機具在文創展演中延伸了意義，也使得襲產物依附於產業經濟價值。洲南鹽場的機具承載了身體操演，勞動者、技術和機具的協作，多重行動者的連結及價值演繹，則是使襲產物導向了更寬泛的文化經濟價值。於是，襲產化涉及具有社會特徵之物質性的重新組裝，循著不同的價值賦予和保存條件，呈現為不同的社會物質樣態。

關係存有論下的區域、網絡、流態和火形等拓樸空間性，看似以其有效運作的邊界僵固性之差異來區分：從最僵滯的區域、彈性連形的網絡，到以變動為常態的流態，以迄穿越長遠隱匿時空的火形。不過，就其存在而言，四者並無優劣之分。但是，襲產化本身卻是深具價值賦予和爭辯的歷程，涉及了我們從流變世界中如何揀選（有些人視為搶救）特定的物件、活動、地景、技能，以及它們所體現的意義。那麼，襲產化牽涉的轉化與再連結、客體化，以及不同的物質空間性，或是襲產化做為社會物質性的重組，也就必然是帶有評價的重組。本文並未著力於提出可行的襲產化、展示和再利用策略，而是藉由援引關係存有論及社會物質性重組觀點，嘗試深化有關襲產的發問。為何需要重組，為了什麼理由而重組，重組成為什麼等提問，依然是襲產的辨識、評價、保存、詮釋和經營利用的根本探問。

誌謝

本文承蒙審查委員惠賜修改意見，謹在此表達由衷的謝意。

參考文獻

- 王筱瑩，2015。壯年退役，卸下輝煌：北區煉製組第二低硫燃油工場，石油通訊，772: 24-25。
- 文芸、傅朝卿，2011。重思文化遺產的真實性概念：從過去到現在的理解，建築學報，76: 23-46。
- 王巧燕、林爵士、陳至坤、林孟緯，2013。閒置空間結合藝術美學發展文創產業之研究：以臺南仁德糖廠十鼓文化村為例，現代桃花源學刊，3: 1-26。
- 王玉豐，2002。道地與真實臺灣工業遺址玉技術文化保存，科技博物，6(2): 58-65。
- 王志弘，2002。技術中介的人與自我：網際空間、分身組態與記憶裝置，資訊社會研究，3: 1-24。
- 王嵩山，1990。物質文化的展示，博物館學季刊，4(2): 39-47。
- 李中文譯，Marx, K. 原著，2016。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臺北：暖暖書屋。
- 李如菁，2002。物質文化研究文獻評述，設計研究，2: 45-52。
- 沈錡美，2015。水地風光人曬鹽：洲南鹽田濕地的里海經驗，台灣濕地雜誌，95: 16-23。
- 林巧璉，2021。台積電中油高煉廠設廠用地 通過高市都委會審議，聯合報，2021/12/22。
<https://udn.com/news/story/7327/5981057>。
- 林崇熙，2012。古蹟保存的生命真實性：一個東莒的緣份，文化資產保存學刊，20: 51-68。
- 邱淑宜、林文一，2019。臺北市西門紅樓創意街區的真實性修補及其治理，都市與計畫，46(1): 1-31。
- 施國隆，2009。國際共識下的工業遺產保護，文化資產保存學刊，10: 5-12。
- 夏鑄九，2006。對臺灣當前工業遺產保存的初期觀察：一點批判性反思，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13: 91-105。
- 徐裕健，2007。臺灣歷史保存論述思維架構的重構與實踐：「臺北賓館」修復再利用個案，城市與設計學報，18: 85-153。
- 張育銓，2016。全球重要農業遺產系統的主體性與真實性建構：臺東池上水圳耕作區與花蓮壽豐河川地種植的案例分析，民俗曲藝，193: 129-219。
- 張崑振，2012。日治時代臺北工場建築遺構的真實性探討，文化資產保存學刊，21: 39-60。
- 許如凱，2015。熄燈號，石油通訊，772: 19-21。
- 楊凱成，2011。鹽業文化資產觀光下的記憶製作，博物館學季刊，25(3): 5-41。
- 萬毓澤譯，Callinicos, A. 原著，2007。創造歷史：社會理論中的行動、結構與變遷。臺北：群學出版社。
- 潘欣榮，2007。公賣局私有化過程中的產業遺產保存：臺北建國啤酒廠工人的工作權保存經驗。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 謝依宗，2010。八大產業再生計畫：布袋洲南鹽場快樂鹽田心鹽村。朝陽科技大學 2010 年工業設計系專題設計報告書。
- Brydon, S., 2019. Arctic hunters, American explorers, adventurers, and anthropologists: The ex-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 Collection of Kayaks at the Canadian Canoe Museum.

- Museum Anthropology, 42(2): 71-88.
- Casey, V., 2005. Staging meaning: Performance in the modern museum. *The Drama Review*, 49(3): 78-95.
- Chung, Y. S. S., 2003. Object of exhibit: Legitimizing the building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Kore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9(3): 229-242.
- Fenollosa, L. T. and Johnston, H., 2015. Protest artifacts in the Mexican social movement sector: Reflections on the “stepchild” of cultural analysis. *In: Almeida, P. and Cordero Ulate, A. (Eds.), 2015, Handbook of Social Movements across Latin America.* pp. 61-76. Dordrecht: Springer.
- Heitman, C. C., 2017. The creation of gender bias in museum collections: Recontextualizing archaeological and Archival collections from Chaco Canyon, New Mexico. *Museum Anthropology*, 40(2): 128-142.
- Humphries, C. and Smith, A. C. T., 2014. Talking objects: Towards a post-social research framework for exploring object narratives. *Organization*, 21(4): 477-494.
- Latham, K. F., 2012. Museum object as document: Using Buckland’s information concepts to understand museum experiences.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68(1): 45-71.
- Law, J., 2002. Objects and spaces.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19(5/6): 91-105.
- Law, J. and Hetherington, K., 2000. Materialities, globalities, spatialities. *In: Bryson, J., Daniels, P., Henry, N. and Pollard, J. (Eds.), 2000, Knowledge, Space, Economy,* pp. 34-49. London: Routledge.
- Law, J. and Mol, A., 2001. Situating technoscience: An inquiry into spatialiti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9: 609-21.
- Lowman, B. C., 2018. Marking ownership on Ainu objects: Three museum collec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Museum Anthropology*, 41(1): 46-60.
- Loxham, A., 2015. Shaped by familiarity: Memory, space and materiality at Imperial War Museum North. *Museum & Society*, 13(4): 522-538.
- Miller, D., 1987. *Material Culture and Mass Consumption.* Oxford: Blackwell.
- Mol, A. and Law, J., 1994. Regions, networks, and fluids: Anaemia and social topology.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24 (4): 641-71.
- Pickering, A., 2010. Material culture and the dance of agency. *In: Hicks, D. and Beaudry, M. C. (Eds.), 2010, The Oxford Handbook of Material Culture Studies,* pp. 191-208.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vensson, T., 2008. Knowledge and artifacts: People and objects. *Museum Anthropology*, 31: 85-104.
- West, S. and Marion B., 2010. Heritage as performance. *In: West, S.(Ed.), 2010, Understanding Heritage in Practice,* pp. 277-312. Manchester, U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收稿日期：2021年9月15日；接受日期：2022年1月12日

作者簡介

賴子儀：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王志弘：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

Reassembling Socio-materiality: The Differential Heritization of Industrial Equipment

Zih-Yi Lai* Chih-Hung Wang**

Manuscript received September 15, 2021; accepted January 12, 2022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put forward ontological propositions of heritage to deepen the discussion on heritage conservation. Heritization involves the interpretation, value assignment, display, and representation of objects, meaning their re-objectification and reassembly. In this article, examples of the preservation and display of equipment in industrial ruins are utiliz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ocial-materiality and preservation strategies.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bjects. The authors first review the positioning of physical objects as historical witnesses, symbolic objects for narrative identification, and performative objects for social action in heritage conservation. They next put forward the viewpoints of objectification, the relational ontology of objects, and the reassembly of social-materiality, to expand the possible forms of objects in heritization. Subsequently, they explain the material properties, heritization types, limitations, and possibilities for equipment using specific examples of the Ten Drum Creative Park at Rende Sugar Factory, CPC Corporation Kaohsiung Refinery, and Jianguo Brewery based on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second-hand data. The Zhounan Salt Field serves as a reference for non-industrial industries with less equipment, which can also be repositioned and reassembled to place heritage within the broader dynamics of social relationship, cultural performance, and place-making, while avoiding specimen thinking.

Keywords: industrial heritage, objectification, relational ontology, material culture

* PhD Candidate,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mail: D03544004@ntu.edu.tw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mail: chihhungwang@ntu.edu.tw